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1.015

掀起革命的巨潮

——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徐 鹏^{1, 2}, 傅卫勇³

(1. 西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2.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3. 中共井冈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 要: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 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 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 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 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 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 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 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 湘鄂川黔苏区; 革命运动; 文艺动员

中图分类号: K2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1-0116-09

Setting off a Great Tide Revolution: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and Art Mobilization in the Hunan-Hubei-Sichuan-Guizhou Soviet Areas

XU Peng^{1, 2}, FU Weiyong³

(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12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of Party History and Local Records of Jinggangsh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nggangshan 3436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Hunan-Hubei-Sichuan-Guizhou Soviet are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deeply absorbe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Hubei and the Eastern Soviet area of Guizhou, on the other hand tightly grasped the favorable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art movement in the Hunan-Hubei-Sichuan-Guizhou Soviet areas, took literary and art propaganda as the first means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and set off a huge tide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In this massive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the Hunan-Hubei-Sichuan-Guizhou Soviet areas formulated scientific mobilization goal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propaganda, actively constructed a network of literature and art

收稿日期: 2023-09-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 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构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问题链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XJYZ202331)

作者简介: 徐 鹏, 男, 陕西山阳人,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党建; 傅卫勇, 男, 江西吉安人, 中共井冈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廉政文化与廉政建设。

propaganda organizations covering the Soviet area, extensively carried out various and colorful literature and art propaganda activities, which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Hunan-Hebei-Sichuan-Guizhou Soviet areas, greatly promoted the wide spread of Marxism in the Hunan-Hubei-Sichuan-Guizhou Soviet areas, and successfully explored the correct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Keywords: Hunan-Hubei-Sichuan-Guizhou Soviet area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iterature and art mobilization

湘鄂川黔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低潮时创建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被誉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 的柱石^{[1]303}”。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湘鄂川黔苏区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等坚持时间长、区域面积大的苏维埃区域的研究。即使是已有成果,也大多是围绕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历程、历史地位和重要党史人物等方面的宏大叙事研究,而缺少在微观时空、人性心理和“他者视野”等维度的具象考察,特别在大历史观背景下对苏区革命运动的文化解读^[2-10]。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现场”后不难看到,“组织起来”的革命文艺在短促而激烈的艰苦斗争中释放出的强大能量。因此,本文拟运用现有党史文献资料对湘鄂川黔苏区的文艺动员历史活动进行探讨,揭示其发生根源、历史过程和深远影响,以期对湘鄂川黔苏区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覆前戒后:湘鄂川黔苏区创建前苏区革命动员的历史考察

站在历史的长河回望,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烽火是由两支千里转战而来的红军队伍共同点燃的。具体到苏区的革命文艺动员,湘鄂川黔苏区的文艺动员活动与湘鄂西苏区和黔东苏区的过往实践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几大苏区革命文艺建设战略重组的结果^[11]。因此,在讨论湘鄂川黔苏区的文艺动员前,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探究,以说明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成功的历史渊源。

(一)湘鄂西苏区文艺动员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

在开辟湘鄂西苏区的过程中,周逸群、贺龙等高度重视文艺的革命动员功能。当时,红军每到一地就派出宣传队,先用新式乐器表演吸引群众

聚集,然后通过教唱革命歌曲和表演节目等方式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传播革命道理;而等到苏区环境相对稳定后,文艺更加被赋予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使命。1931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通过《关于苏区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改进并加强文化宣传工作^[12]。湘鄂西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后,苏区的文艺建设也随之全面展开。一是在苏区各个中心城镇普遍建立乡村俱乐部;二是组织成立通俗讲演社、化妆剧社和演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三是举办党校和干部训练班,以提高苏区党团、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等系统的干部做文艺宣传动员工作的能力和素养;四是开办工农夜校和冬学,在进行文化扫盲的同时,培养苏区群众的文艺素养;五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形式多样的文艺宣传活动。每逢红军战斗胜利和各种纪念日到来,苏区政府就组织军民集会,将党的主张和红军的英勇事迹改编成的歌曲、戏剧和传统曲艺等节目搬上舞台进行表演。其深受工农群众的欢迎,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投身土地革命、参军扩红和支前参战的热情。到1930年夏天,湘鄂西苏区成为了一块超过17个县、有2万左右主力红军的革命根据地^[13]。

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央后,作为革命机器有机组成部分的文艺宣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与其他苏区相比,“左”倾路线对湘鄂西苏区文艺动员工作的破坏尤为严重。1931年3月,夏曦到达湘鄂西苏区并掌握苏区最高领导权后,一方面极力推行“左”的错误政策,破坏湘鄂西苏区文艺动员的社会基础。比如,在分田斗争中,夏曦强迫贯彻“反富农路线”,把“彻底平分一切”作为苏区分田宣传的中心口号,个别地方在宣传中甚至喊出“杀尽地主、赶走富农”的极端口号;在反“围剿”战争动员中,夏曦忽

视敌我实力悬殊情况,提出“不使苏区的一切土地被敌人蹂躏”的错误动员思想,并且采取强制命令手段,把文艺宣传的情感动员变为强迫动员。另一方面,他打着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进行扩大化肃反,瓦解湘鄂西苏区文艺动员的组织基础。根据夏曦1932年7月向中央提交的报告统计,仅在1932年5月到7月间的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运动中,上到师政治部主任,下到一般宣传科员,超过百名政治宣传系统干部遭到错误逮捕^{[14]274-283}。在连续不断的肃反“清洗”下,湘鄂西苏区内部人人自危,大家对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充满畏惧,整个文艺动员体系因此趋于瓦解。

历史事实证明,夏曦的这种“以极端化、绝对化、狭隘化的革命动员方式去盲目追求脱离实际的动员内容和目标的实现”^[15]的动员方式,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动员效果,反而使得文艺宣传在党组织和红军严密的组织体系加持下成为错误路线的“放大器”。扩红和肃反的双重压力,更是“使群众对战争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恐怖,逐渐出现了抵制革命动员现象”^{[16]200},最终造成湘鄂西苏区革命动员的失败。

(二) 黔东苏区文艺动员日趋勃兴的战略转变

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没有引起夏曦的反思,反而更加促使他不断扩大肃反的范围,甚至发展到擅自解散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取消政治机关的地步。其做法不但在根本上取消了红三军中的文艺动员体系,而且导致部队内部失败情绪蔓延,“没有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来固守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实际工作陷于麻痹消极的状态”^{[14]297}。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夏曦终于有所醒悟,认识到文艺宣传在团结队伍、鼓舞士气和动员群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34年6月,枫香溪会议决定成立军委会宣传队,分散到黔东各地进行文艺宣传,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由此,红三军的文艺动员工作开始了由低潮到高潮的复兴转折。

随即,红三军组成了七、九两师宣传队深入黔东地区的沿河、印江、德江和松桃等地宣传发动群众^{[17]36}。在创建黔东苏区的过程中,红军宣传队开展了大量的文艺宣传活动,其包括在房前屋后刷写革命标语、漫画,印发传单,在大小集会

上表演从湘鄂西苏区带来的革命歌曲,根据黔东地区传统民歌、曲艺等形式改编反映党和苏维埃政策与红军英勇事迹的文艺作品。在红三军接地气的文艺动员下,黔东地区的土地革命迅速发展,建立了纵横200余里,约5个县的苏维埃政权,“扩红”千余人,并组建了几千人的地方武装^{[17]192}。与此同时,黔东苏区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成为黔东苏区文艺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黔东苏区群众不但创作了《扛起梭镖跟贺龙》《贺龙的红军爱苗胞》《十唱送郎当红军》等颂扬共产党和红军的文艺作品,而且成立了“枫香溪红色妇女姊妹团”等群众性文艺团体,“她们逢场遇会演出,走村串寨演出,不到4个月,‘姊妹团’就名扬黔东特区了”^{[18]74-75}。

总的来看,从红军被迫退出湘鄂西苏区到开辟黔东苏区这一时期,红三军的文艺宣传工作经历了艰难且痛苦的转折过程,但也在艰苦的斗争中保存了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希望和火种。第一,实现了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由消极状态到积极状态的深刻转变,革命文艺重新成为红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有力武器;第二,开始逐步消除“左”倾错误路线对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负面影响,为红军开辟新苏区文艺动员提供了“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19]792};第三,锻造了一批经历残酷斗争考验的文艺宣传骨干力量,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宣传动员新局面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待势趁时:湘鄂川黔苏区文艺运动勃兴的社会条件

如何充分动员起一般群众对革命的热情和支持是文艺宣传动员的首要任务,但在逼仄激烈的发展空间中,“苏区文艺的发生不是单一力量造成的历史‘突变’,而是多元历史、文化动因合力作用的产物”^[20]。湘鄂川黔苏区文艺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与该地区具备有利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一) 优越的地理环境利于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

站在军事地理学的视角看,湘鄂川黔苏区所在的湘鄂川黔边地区与红军此前活动的湘赣边界、赣南和闽西地区相比,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一是湘鄂川黔边界西倚云贵高原、东临洞庭湖区,

武陵山脉横贯其境,境内山峦林立、溪河交错、沟壑纵横,地形十分险要。二是当地距离武汉、长沙和重庆等敌人统治中心城市均有千里之遥,且有山川阻隔,其属于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三是湘鄂川黔边界虽然冈峦错峙、道路险绝,但因为贯通全境的沅江水道,素有“湖右四塞咽喉之邦”之称。这也造就了湘鄂川黔边界“兼具交通便利和交通阻塞的双生优势,前者有利于激进思想的传播,后者利于军事根基的奠定”^[21]。一方面,其有利于湘西地区实现对周围地方性文化的快速汇聚,包括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吸收和传播;另一方面,其有利于红军在革命战争中对当地传统的山歌、曲艺和民族歌舞等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快速收集、改编和传播,进而运用到革命文艺动员中去。红二、六军团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建立起湘鄂川黔苏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文艺动员场域的优越性。

(二)落后的社会状况适合革命思想的进场和传播

贫穷落后的社会环境是中共得以点燃湘鄂川黔边界革命火种的根本条件。这里由于山深地僻,封建生产关系在湘鄂川黔边界根深蒂固。“以根据地中心区域大庸、永顺、龙山、桑植等县为例,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和森林被占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豪绅霸占。”^[11]落后的经济形态带来的是政治上的黑暗和腐败。1927年起,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在蒋介石支持下成为湘西地区的“太上皇”。他借助“清乡”的名义积极收编土匪武装,强迫组织民团,借此加强对湘西地区社会政治权力的控制。在封建政权、族权和神权的三重压迫下,湘西农民的生活极端困苦,一村一乡,百业荒废,倾家荡产者不可胜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外,湘鄂川黔边地区还有着相对其他苏区更为复杂敏感的民族矛盾。湘鄂川黔边界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奉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当地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尽管长期遭受着压迫和剥削,但与生俱来的“认命”心理、保守思想和低信度社会认知让民众虽充满斗争情绪却不敢轻言反抗,就像“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22]¹⁰²。因此,在共产党和红军作为外来力量进场后,伴随着物质利益落实而开展的文艺动员活动很容易为饱受压迫

之苦的农民接受,在不知不觉中打开他们的心理之门,进而升腾起他们参加革命的愿望和动力。

(三)丰富的文化资源提供了革命文艺的发展土壤

源远流长的民间文艺自古就是湘鄂川黔边地区的一道亮丽社会图景。古籍有载,“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如前所述,湘鄂川黔边地区虽然山高路远,但却有着便利的水路交通,自魏晋到明清时期,陆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移民因战争或生存等原因迁入湘西地区。他们与世居本地的汉族和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这里因此形成了兼具湖湘文化、巴渝文化、荆楚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具有鲜明风格特色的湘西文化。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湘西地区人民贫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剂”。每逢传统节日,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可以看到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搭台唱戏,“如春节玩狮、跳灯,清明赛歌,重演赋诗;土家族传统节日年舞摆手、演茅古斯;苗族传统节日四月八、赶秋时打苗鼓、唱苗歌、玩八人秋等”^[23]。因此,在红军到来并建立苏区后,这些具备一定文艺水平的民间艺人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艺形式就自然成为苏区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苏区文艺动员的重要基础。同时,湘西地区群众敏锐的文艺触觉使得他们更习惯于通过文艺宣传形式进行的革命精神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的门槛,拓展了苏区文艺宣传活动的空间,有助于文艺宣传在苏区军民中发挥深入持久作用。

三、历史回声: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的实践考察

作为一支外来军队,红二、六军团刚进入湘西北地区时,并未如想象中那样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相反,当地群众对红军往往持一种警惕与排斥的态度,并担心革命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16]³⁷。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湘鄂川黔苏区开展了大规模、有目的、有组织的文艺动员活动,其推动了苏区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

(一)准确制定苏区文艺动员的目标内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兴起后,文艺宣传

就成为党和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的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86} 为了把革命文艺真正变成“战斗的号角”,湘鄂川黔苏区根据苏区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了苏区文艺动员目标内容。

一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湘鄂川黔苏区的战略任务准确制定苏区文艺动员总的目标内容。1934年12月,湘鄂川黔省委通过的《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的决议》提出,苏区革命动员的总目标是“动员千百万新区工农群众,为巩固发展苏区,争取决战胜利,配合西方军和全国苏区红军,争取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紧急战斗任务”^{[1]173};同时强调:“党应在广大群众当中,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战争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进攻苏区红军的每个事实,进行广泛宣传,揭破国民党和各反动派别一切改良欺骗政策。同时应通俗地解释苏维埃中央政府各种法令、训令、宣言、苏区建设和红军胜利,来提高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仇恨,加深群众的阶级教育。”^{[1]177}

这个动员目标,既是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倡导的“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也是对创建和发展新苏区时可能遇到的群众沉默与抵制心理问题的积极回答,是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的根本指导方针。

二是根据湘鄂川黔苏区战略任务和斗争形势的变化,调整不同阶段文艺动员的具体目标内容。1935年1月,面对湘鄂两省军阀的第一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战争动员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去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24]。湘鄂川黔省委随后发出的战争动员指示也表明,进行扩红、建政和兵运是这一阶段苏区动员的主要任务。1934年5月起,随着国民党军阀对苏区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不断加强,克服文艺动员中存在的轻敌和悲观思想成为这一时期苏区文艺动员的重要任务。在湘鄂川黔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前夕,任弼时再次强调,当前红军的文艺宣传工作既要反对“动摇、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思想”,也

要打击“放松一切艰苦的动员工作的‘左’的观点”^{[1]313}。在湘鄂川黔省委根据反“围剿”的实际情况作出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后,苏区文艺动员的内容也适时转变为“进行长途行军的政治准备”,包括宣传解释“东征”意义、宣传扩红等在内的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动员^{[1]334-337}。

(二) 积极建构苏区文艺动员的组织网络

“组织起来”,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文艺战线的战略方针,也是激发苏区文艺强大革命动员力量的制度选择。为了把苏区一切有用的文艺资源都充分调动起来,湘鄂川黔省委推动建构了一个以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为基本单位的本土化文艺宣传组织网络,为提高苏区文艺动员的有效性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一,建立和发展苏区各级党组织。在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党组织的力量始终薄弱。随着湘鄂川黔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日趋繁重的文艺动员工作急需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掌握群众生活、心理习惯的地方党员来参加宣传工作,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的任务变得迫在眉睫。1934年12月,湘鄂川黔省委的《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大开其门”,用“艰苦的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1]334-337}去吸引群众。在红军工作队的艰苦努力下,“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3月,桑植县党员由50多名发展到500多名,永保县由几十名发展到300多名,大庸县发展了100多名,郭亮县也发展了60名”^{[25]172},先后有9个县、200多个乡建立起地方党的组织。湘鄂川黔苏区由此建立起以省委为枢纽,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党组织为两翼,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统一领导的层级架构为主轴的苏区文艺动员领导系统。

其二,健全和完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艺宣传机构。根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法令,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应该设立专门的文化主管部门,负责领导和组织本区域内的文化教育事业^[26]。因此,湘鄂川黔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在组织成立时,就设有专门的文化宣传机构,并组织了专业的宣传员队伍。尽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湘鄂川黔苏区的控制范围并不稳定,苏区中心区以外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变动频繁,但各地已经组织起来的

苏维埃政府大多能够担负起本行政区域内的文艺动员工作。借助于苏维埃政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湘鄂川黔苏区就迅速地建立起了一个遍布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

其三,组建大众化的文艺宣传队伍。同中央苏区相比,湘鄂川黔苏区虽然没有职业的文艺创作人才,也缺少专业的文艺宣传人员,但却有着数量众多、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他们虽不起眼,但却“最清楚农民的文化心理和需求,最熟悉民间文艺形式”^[27],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此,苏区的党员干部主动与其进行接触,通过谈心、诉苦和共同表演等方式把他们吸引到苏区的文艺动员队伍中来。同时,湘鄂川黔苏区还积极发掘红军和苏区干部中的文艺人才,并对其进行相应培训,而后将他们分配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各单位中从事分田、筹款和扩红等任务的文艺动员工作。这些人大多是湘西本地人,在地缘和血缘上有着独特优势,他们的动员工作能引起群众的关注,打开群众的心理防线。

(三) 广泛开展各类文艺宣传与表演活动

在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战争的残酷和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阻挡住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对美的文化的追求。在党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广泛开展各类文艺宣传与表演活动,“将整个乡村社会纳入革命化的轨道”^[27],拧成革命的一股绳。具体来看,这些文艺动员活动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编印传单,刷写标语、宣传画等。这类

文艺动员活动具有简单易行、灵活实用和易于传播等优势,是红军开辟和发展苏区过程中最普遍使用的文艺动员手段。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化革命标语、传单和宣传画的思想宣传和动员功能,湘鄂川黔苏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统一拟定标语和传单,规范标语和传单宣传与动员的内容。1934年12月,为了做好旧历年关斗争的宣传动员,湘鄂川黔省委宣传部专门拟定了18条标语口号,要求“多写传单标语散发,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年关斗争”^{[18]199}。其次,利用一切时机制作和张贴标语、传单和宣传画。1935年8月,红军向外线出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组织红军宣传队,在津市的六家印刷厂和醴县的十多家印刷厂赶印宣传品,导致津市醴县一时出现了‘洛阳纸贵’现象,各商店的纸张都买光了”^[29]。遍布苏区各个角落的革命标语和传单更是让国民党反动当局也不禁哀叹:“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18]71}长征初期跟随红六军团行动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回忆:“所有建筑都写满了标语,内容大都是号召政府军中象他们一样的工农穷兄弟‘掉转枪口,参加红军!’”^[30]具体来看,这些革命标语和传单如表1所示,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政策和主张;二是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参加红军;三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罪行;四是宣传拥护苏联和发展抗日^{[18]88-120}。

表1 湘鄂川黔苏区宣传标语内容与主题

时间	地点	宣传标语内容	宣传主题
1934年	永顺县沙坝乡	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揭露罪行
1935年	桑植县刘家坪乡	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扩大红色的军队!	动员扩红
1935年	龙山县茨岩塘乡	红军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	动员扩红
1935年	龙山县新城乡	庆祝忠堡战争胜利!	庆祝胜利
1935年	桑植县陈家店	活捉白军师旅团长!	庆祝胜利
1935年	宣恩县九家店	实现土地法!	宣传政策
1935年	龙山县新城乡	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宣传苏联
1935年	沅陵县桥梓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宣传抗日

由于根据地内缺少纸张、油墨和专业人才,湘鄂川黔苏区无法像中央苏区那样大量印刷出版报纸、漫画等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宣传品,但苏区军民因地制宜,将革命标语的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后大量绘涂于当地的木板房上。原本难以识

记的文艺符号转化为形象化和艺术化的漫画、组字画等宣传画的形式,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增添了更为强烈的革命感情色彩。比如,如图1所示,红军战士用“国民狗党”四个字组成一只狗的形象,用来揭露并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甘当帝国主义压榨

和剥削中国的走狗,以此激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18]85}。



图1 漫画:“国民狗党”

第二,在各种晚会、联欢会和群众大会上进行文艺节目表演。与标语、传单等文字宣传品相比,歌谣、戏剧、舞蹈和传统曲艺等这类被搬上舞台的文艺作品,不仅在叙事方法和内容上更加容易建构革命的意识形态,而且在题材和体裁上更为活泼和多元,表达出的思想和情感也更近人心,因此特别受到苏区军民的欢迎。不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前线,还是在分田、扩红的群众集会现场,处处都可以看到文艺表演的热闹场景。根据对现有党史资料的统计,湘鄂川黔苏区的文艺宣传作品种类如表2所示^[18,31-32]。

表2 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艺作品现存数量及种类

作品形式	现存数量	代表作品
红色标语	390	“共产党十大政纲”“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
宣传画	14	龙山县鸡公寨“帝国主义”组字画
歌曲小调	133	《十杯酒》《逼债歌》《土地之歌》《唱红军》等
民间歌谣	258	《十绣》《赤溪河畔歼顽敌》《十送红军》《红军与白军》等
曲艺戏剧	19	《十唱红军》《红军领导闹革命》《龙家寨打败周矮子》等
传说故事	18	《智算华容道》《踩生》《智擒尤八》等
总计	832	

一是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和湘赣苏区带来的红军共同传唱的革命歌曲和家乡民谣,包括《红军歌》《红军歌》《暴动歌》《红军纪律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爬山兰》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桑树儿搭灯台》。这首土家族民歌经过贺锦斋烈士重新填词改编,曲调婉转、语言优美、感情真挚,不但唱出了红军战士的坚贞爱情,而且表达了革命者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在创建和保卫湘鄂川黔苏区的战斗中,很多原红二军团的战士唱着这首歌重新回到桑植县,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二是湘鄂川黔苏区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人员根据新的文艺形式创作的反映苏区革命和战斗生活的文艺作品,包括歌曲《冲上前去保弟兄》《水杉树儿放光彩》《早盼晚盼红军来》和话剧《童养媳好命苦》《打倒陈鸣皋》等。例如,曾在苏区广泛演出的戏剧《童养媳好命苦》,虽然没有正式剧本,但却用简单的语言深刻描绘了旧社会童养媳“在红军的帮助下,童养媳走上了光明之路”的新生过程,号召苏区广大妇女同胞起来积极参加红军^{[18]304-305}。

三是苏区军民用地方民间文艺的曲调和韵律

重新创作的歌颂革命和红军的民间歌谣与地方曲艺作品,包括山歌《接龙桥》《十思念》《鱼儿靠水水养鱼》,花灯词《十杯酒》《唱红军》,花鼓词《打龙山》,鱼鼓词《打郭汝栋与陈耀汉》和花灯对唱《送郎当红军》,等等。这些文艺作品节奏生动明快,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湘鄂川黔苏区各种文艺表演场合的主角。如现今流传于湖北咸丰、宣恩一带的《十二月歌》,把传统的侗族农事歌谣重新填词,将原本描述四时节气和家庭经济特征的歌词改为号召争取革命胜利的新歌词,感情真挚热情,把民族文化与革命史诗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精神感染力。

四、功标青史: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实践的历史贡献

苏区文艺既因革命战争而兴,又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革命战争环境的客观制约,但不能否认的是,作为湘鄂川黔苏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宣传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作为苏区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湘鄂川黔苏区的文艺动员实践也对革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为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红军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的过程中,文艺宣传始终是“第一个重大工作”^[33]。在当时的湘鄂川黔苏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红军、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进行文艺表演的热闹场景。在各种文艺宣传的大力动员下,苏区内经常可以看见人民群众踊跃参军扩红和支援参战的热烈场景,有不少地方出现兄弟姐妹齐参军、父子夫妻上前线的动人情形。据不完全统计,“湘鄂川黔根据地先后共有1.7万人参加红军投身革命,8万余人参加和支援红军作战,1万多人壮烈牺牲。”^[1]大庸县的侯青芝一家,全家8口人都参加了红军,4人在长征中牺牲。同时,苏区群众还积极筹粮筹款支援红军。“据调查统计,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一年间,大庸县城工商户共上交筹款三万五千多元。”^[34]历史事实证明,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文艺以其鲜明的战斗性、突出的阶级性和丰富的情感性成为湘鄂川黔苏区响亮的“战斗的号角”,为湘鄂川黔苏区的开辟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传播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正处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阶段。1935年之前,虽然湘西地区已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不论是传播范围还是传播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在湘鄂川黔苏区,苏区的文艺工作者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植入到文艺作品和表演中,在保持原有的灵活韵律和格式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苏区广大群众的头脑深处。通过《农民协会歌》《农民歌》《红军歌》《工农革命歌》和《拥护苏维埃》等歌谣,到处宣传“革命”“苏维埃”“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概念。通过教唱和表演此类革命歌曲,一方面让群众明白苏维埃革命的性质、目标和前途等基本道理,另一方面推动他们确立起朴素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自此在湘西地区生根发芽。红军撤离苏区后,苏区各族人民依然传唱着《不打胜仗不还乡》《红军大战十万坪》等革命歌谣,用歌声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真理。

（三）对中国革命文艺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

苏区文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思想从国际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逻辑枢纽^[35]。湘鄂川黔苏区的文艺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取得的实践成果也不尽丰富,但在这个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其依旧积累了不少值得后来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借鉴的经验。一是必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艺动员的成功,关键在于“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22]50}。革命文艺只有“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的立场和党的政策立场”^{[19]848},才能完全成为“革命的武器”。二是必须紧紧扎根群众。湘鄂川黔苏区文艺运动的成功,与苏区广大军民的付出和努力是分不开的。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归根到底是为工农兵服务。只有紧紧扎根群众,满足群众的需求,才会有无尽的动力。三是必须密切联系实际。革命文艺从湘鄂西苏区到湘鄂川黔苏区,在短短5年中经历了一个“大落大起”的过程,革命文艺与革命现实的结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不论是革命文艺路线,还是具体的文艺政策,都必须始终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否则,其不但无法发挥作用,反而会成为错误路线的“加油站”,贻害无穷。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36]文艺既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反映,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现实动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文艺区分为城市“格子间”里的左翼文艺和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战争文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顽强生存于苏区根据地的战地文艺也在默默积蓄力量,沿着人民战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路从小到大、由弱变强”^[38],搭起了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之间的桥梁。湘鄂川黔苏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不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而且是苏维埃革命理想主义和农民现实意识的碰撞、协调和互动。在激情澎湃的革命文艺动员下,无数农民被吸引进入革命队伍中,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虽然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早已过去,但是,历史的记忆却保存在湘鄂川黔苏区流传下来的诸多革命文艺作品中。这些革命文艺作品,不但因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细腻的审美感情、优美的旋律节奏和浓郁的地方风格而成为我们学习党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教育的宝贵资源,而且还作为历史的路标,时刻提醒我们要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编写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 [2] 黄道炫.革命的张力与历史的弹性:苏区史研究的再解读[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33(2):24-26.
- [3] 魏少辉.“他者”视野与苏区史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4):17-24.
- [4] 游海华.战时环境、人性、长时段:苏区史研究应有的维度[J].中共党史研究,2021,270(6):38-45.
- [5] 谢建平.关于苏区史研究再思考的学术立场[J].中共党史研究,2018(7):127-128.
- [6] 文斌.湘鄂川黔苏区史研究的回顾与评价[J].怀化学院学报,2022(4):1-4.
- [7] 王文珍,高青.从文化视野看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J].湘潮,2022(2):49-51.
- [8] 徐祝申.论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建设[J].世纪桥,2018(3):58-59.
- [9] 谢开贤.论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的文化建设[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
- [10] 戴思佳.湘鄂川黔苏区红色标语的宣传动员作用及其启示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21.
- [11] 夏远生,肖绮晖.论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发展与历史地位[J].苏区研究,2016(1):43-59.
- [12] 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G].长沙:[出版者不详],1986:64-66.
-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洪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洪湖文史:第3辑[M].洪湖:[出版者不详],1988:41.
-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G].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 [15] 王莲花.中央苏区后期革命动员的困境与对策:兼论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影响[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3):144-151.
- [16] 钟日兴.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00,37.
- [17] 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黔东南革命根据地史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18] 《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编辑小组.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0] 刘文辉.苏区文艺研究七十年:历史与路向[J].苏区研究,2020(4):113-128.
- [21] 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J].中共党史研究,2020(3):47-66.
- [2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3]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新华书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文化志[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222.
- [24] 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5.
- [25]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 [26] 全国人大图书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
- [27] 罗立桂.延安民间艺人改造的意义:以文艺“形式”问题为视角的考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1):99-104.
- [28] 张宏卿,肖文燕.“边缘化战略”:中共动员与中央苏区民众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J].开放时代,2011(8):36-56.
- [29] 唐莉敏.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印刷传播活动探析[J].湖湘论坛,2005,18(4):28-29,47.
- [30] R A 勃沙特.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的见闻录[J].严强,席伟,译注.贵州文史丛刊,1989:115.
- [31] 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武陵红叶:第2集[M].吉首: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1985:275-289.
- [32] 中共涪陵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四川部分):附件[M].涪陵.中共涪陵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2:177-179.
- [3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6.
- [34]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77.
- [35] 刘超.从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立场转变及原因[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2):26-32.
-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30.
- [37] 林岗.从战地文艺到人民文艺: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文艺评论,2021(1):49-57.

责任编辑:黄声波